



当代外国文学名著译丛

致命的一击

〔法〕玛格丽特·尤瑟娜尔 著

周光怡 刘国政等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Marguerite Yourcenar
LE COUP DE GRACE

根据法国 Callimard 1974年版本译出

致命的一击

(法) 玛格丽特·尤瑟娜尔 著

周光怡 刘国政等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宜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625印张 2插页 120,000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800

统一书号：10107·464 定价：1.00元

目 录

致命的一击……………[法] 玛格丽特·尤瑟娜尔 著

周光怡 刘国政译(1)

情人……………[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蒋庆美译 理达校(78)

最后一代贵族的自白

——《致命的一击》评析……………应天士(168)

致命的一击

〔法〕玛格丽特·尤瑟娜尔 著
周光怡 刘国政 译

清晨五点钟，天下着雨，埃里克·冯·罗蒙在比萨车站的餐厅里等火车回德国去。他在萨拉戈斯负伤后曾就医于意大利水上医院。他长得一表人材，虽说已是四十岁上下的人了，却一点也不见老。埃里克的祖上是法国人，母亲是波罗的海人，父亲是德国人，他从父母那儿遗传了瘦削的体形、淡蓝的眼睛、颇长的身材，他轻易不开笑脸，即便微笑也是一脸傲气，走起路来鞋跟着地囊囊有声，这都象他父母。现在他的脚骨折了，今后再也发不出这种声响了。

不觉已等到了黄昏，每逢这时候，多愁善感的人往往会互相倾吐心曲，罪犯则多于此时招供画押，就是最最沉默寡言的人也会开口讲个故事或者回忆一下往事以免打盹。埃里克·冯·罗蒙过去一直顽固地坚持右翼观点，他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在1914年还太年轻，干不了别的事，只能去冒冒险，而战后欧洲一派混乱，他们心里七上八下，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又不肯逆来顺受，这些因素促使他们去从军，反正听天由命，愿为任何成败不定的事业效劳。他曾参加过各种使希特勒得以上台的活动，在夏咯和满洲里呆过，他为弗朗哥卖命之前，曾指挥一个志愿兵团参加库兰德地方反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此刻他那只受伤的脚缠裹得象个奶娃娃似地斜搁在椅子上，他一边讲话，一边漫不经心地摆弄着一只大金表的老式表链，这只表是那么俗不可耐，真亏他还好意思戴在手上。他出自一种怪癖，说话之间总不时地拍桌子，不是用拳头，而是用右手掌，因为这只手戴着一个沉甸甸的饰有纹章的戒指，他每拍一下桌子总要把他的两位同伴吓一跳。柜台后面那个两颊丰满、满头卷发的意大利小伙计早睡熟了，但时时被玻璃杯叮叮当当的声音惊醒。一个浑身湿淋淋的独眼

老车夫，每隔一会儿就不知趣地走进来向罗蒙兜搭生意，建议他去比萨斜塔作一次夜游，罗蒙只得停下话头大声呵斥他。趁罗蒙分心的当儿，他的一个同伴便叫了一杯浓咖啡；后来便听见罗蒙的香烟盒子喀达响了一声，罗蒙突然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无精打采地住了口，拱起肩膀，俯身凑向打火机。他向众人所说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篇没完没了的忏悔罢了。

有一首德国小诗说：“人们对死人遗忘得快。”殊不知对活人也一样忘得快。在里伏尼和库兰德这块偏僻的角落里发生过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战斗，那场内战进展突然，战局表面并不出奇，实际却错综复杂，活象是一堆未熄灭的火常常会死灰复燃，又象是一种不时发作的皮肤病，可是事隔仅仅十五年，我对这场内战中一个个乱糟糟的场面就已经记不清了。何况每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类型的战争，这就象黑麦和土豆一样是一种地方特产。

我一生中最忙的十个月，就是在这个偏僻的县里度过的，我在那儿指挥战斗。这个县的俄语名称、拉脱维亚语名称或德语名称，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报纸读者头脑里是毫无印象的。那儿有几处桦树林，几个湖泊，几块甜菜地，几个肮脏不堪的中心区，在几座满目疮痍的村庄里，我们的部队不时意外地找到一头奄奄一息的猪和几座领主的老房子，这些房子里面都曾遭过抢劫，外部都有子弹擦过的痕迹，就是这些子弹打死了房主和他一家子；还有几个既想发财又怕挨刺刀的犹太高利贷者；有几支我们的部队，但已沦为几帮散兵游勇，而且每一帮里面都是军官多于士兵，其成员通常是些光明异端派和有怪癖的人，再不就是赌徒，也有些体面人，

还有些是棒小伙子、蠢货及酒鬼。

一个亡命之徒（我正是这么一个人）不管他面临什么风险，往往无法真正产生爱憎感，可能我把完全属于我个人的这种感觉普遍化了，不过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我是最没能耐在脑子里找出理由，来激起自己对别人产生爱慕之情和憎恨之心的人。我只知道为我并不信仰的事业去冒险。

波罗的海的形势象个错综复杂的齿轮传动系统，我厕身其间只想尽可能做个金属轮盘，只要不做被它轧碎的手指就心满意足了。对于象我这样一个青年人，还能有别的什么出路呢？我父亲在凡尔登被打死，留给我的全部遗产只是一个铁十字架和一个至多能让我娶个美国女人的头衔，除此之外还有几笔债务和一个靠念佛经和泰戈尔诗集打发日子的半疯的母亲。贡拉在这种动荡不定的生活中至少总还有个固定点，有根纽带，有个中心。他是带有俄罗斯血统的波罗的海人，我是有波罗的海血统和法国血统的德国人，我们都跨越了两个相近的民族。我看得出他有那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本领，总的说来就是欣赏一切而又蔑视一切，而这种能力在我身上既受到培育，又遭到了压抑。也罢，对于我和贡拉在精神、性格、肉体（其中包括被称为“心脏”的那个尚未被完全理解的器官）之间息息相通迹象，我们就别再去进行什么分析了，反正我们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只是他的心跳节奏比我弱些就是了。他父亲对德国人颇有好感，却在德累斯顿附近的集中营里死于斑疹伤寒，那儿有几千名俄国俘虏都被抑郁症和虱子拖垮了；我父亲把我们的姓氏和法兰西血统引以为荣，却在阿戈纳的一条战壕里死在一个为法国服役的黑人士兵手中。这么多阴错阳差的事情，使我后来始终厌恶

一切政治信念而只相信我自己。1915年间，好在战争、甚至丧事在我们看来都等于是放假，我们逃脱了功课，逃脱了考试，逃脱了少年们的一切烦心事儿。

克拉托维塞位于边境上一个有点象死胡同的地方，那时战时纪律已经松弛下来，人事关系就可以代替护照。我母亲因为她死去的丈夫是德国人，所以尽管她是波罗的海人、又是雷瓦尔伯爵的表妹，也未被俄国当局所接纳，但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有好长一段时间倒是眼开眼闭地放行。我的年幼竟成了我的通行证，使我得以和贡拉一道生活在这块荒僻的领地里。我被托付给他的姨母和园丁米舍尔。他姨母是个半痴不呆的老小姐，代表着家中的俄国血统，那园丁则具有良种看家狗的本能。至今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在淡水湖里洗澡或黎明时分在海湾处的咸水中洗澡的情景；我们那一模一样的脚印印在沙地上，随即又被海水抹平，在干草上午睡时，我们谈论当时的问题，一边漫不经心地嚼着烟叶或草茎，深信自己比起先辈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根本没有想到等待我们的只是种种灾难和荒唐事儿。此刻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些溜冰比赛，浮现出我们玩着有趣的“天使”游戏的情景，那是在冬天的下午，大家扑在雪地上，一面挥舞手臂让地上留下象翅膀那样的形迹，在拉脱维亚农庄的正房里，我们盖着农家最好的羽绒被子，在沉睡中度过美妙的长夜，在食物定量配给的年头，我们这些十六岁小伙子的胃口之大使得农妇们既害怕又怜悯。

在这远离战火的北方伊甸园中，女孩子也不少：要不是我对一切痴情举止嗤之以鼻的话，贡拉是会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的，他是那种最怕别人瞧不起的敏感的

人，这种人一旦发现自己有什么东西招致朋友们的嘲笑，哪怕那是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他们也会丢弃。贡拉和我在精神方面就象大理石与白石一样，有着既明显又细微的不同之处。贡拉的优柔寡断不只是年龄的关系：他生来就有那种柔顺、安之若素的气质。大家对地印象很好，他在人们眼中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三十岁的贵族青年，成天与庄园里的少男少女们嬉戏；在人们眼中他的另一个形象是：一位警卫队青年军官，风度翩翩，有点腼腆，舞也跳得极好；再不就是成为俄国体制下一位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战后又会成为一位模仿艾略特^①和让·高克托^②的诗人，出入柏林酒吧。我们只是思想方法不大一样，在体格方面，我们相仿，都是瘦长个儿、结实、灵活，都是褐色皮肤，眼睛的颜色深浅也一样。贡拉的金发颜色比较浅些，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把我们看成亲兄弟，对于那些不能理解我俩的情谊何以如此深厚的人，这种看法倒是省事；要是我们实事求是、申明一下我们并不是亲兄弟，人们至多把这亲属关系推远一层，硬说我们是堂兄弟。

以往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是玩乐，或者干脆一个人呆着。现在我常常去露天咖啡馆，与一些悲观失望的知识分子聊天。我向他们断言我见识过幸福，而且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幸福，这幸福就象那种金币，战前能兑换一把大分币，战后还是可以兑换一叠马克，不受任何货币贬值影响，本身价值始终不变。我说起这事，他们总是诧异不已。我的这些回忆可

① 艾略特——英国诗人、批评家。

② 让·高克托——法国戏剧家。

以使人摆脱德国哲学的框框，使人对生命及死亡的看法简单化。说我那幸福来源于贡拉或者仅仅是来源于我的青春，这都一样，我的青春和贡拉都已同时逝去了。尽管时世艰难，尽管普拉斯珂薇姨母的可怕的抽搐毛病使她的脸都走了形，克拉托维塞仍然是一个宁静的天堂，那儿没有禁忌，也没有蛇。至于贡拉的妹妹索菲姑娘，她头发乱蓬蓬的，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只知道拼命看书。这些书都是住在里加的一个小个子犹太人大学生借给她的。她对男孩子们完全不屑一顾。

可是我该过境到德国去接受军训的年龄已到，不去不行。德国中士们领着我们进行操练，他们由于饿得难受而无精打采，尽在转念头搞面包券。我周围的伙伴中有几个很讨人喜欢，从他们身上已经可看出战后那种乱哄哄场面的苗头了。要是战争再延长两个月的话，我就会被协约国的大炮打中而在阵地上牺牲了，那么眼下我早已无声无息地与法国的泥土、法国的名酒以及法国孩子们即将采摘的桑椹溶为一体了。但我恰巧赶上这样一个局面：我方没有全军覆没，对方也未能凯旋而归。于是双方停战，接着就是革命，通货膨胀。当然，我破产了，我和六千万人的前途都一道被葬送了。在我那个年龄，感情上对什么右派理论、左派理论照理该是一拍即合的，但我对这类坑人的话从未盲目轻信。我已对你们说过，在我身上只有我的五官长相是不由我分说而为上天赋予的，其它的事都由我自己做出决定，决不受外界影响。当时的俄国是个正在爆炸的锅炉，它在欧洲散出了一阵所谓新观念的烟幕。克拉托维塞住着红军的一个参谋部，那时德国与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通讯往来已很成问题了，而贡拉

又是那种从不写信的人。我认为自己已长大成人；这是当时我这个青年人唯一可能实现的奢想，但不管怎么说，与克拉托维塞的少年男女们和那位上了年纪的痴女人相比，自然我在经历和年龄方面都成熟得多，我开始意识到一种家庭责任感，考虑到要保护那个年轻的姑娘索菲和那位老姨母。

我在库兰德有几个朋友，我熟悉这个地方，会讲当地语言，甚至还会几句土话。我力图尽快回到克拉托维塞，但仍花了三个月时间，才走完约一百公里的路程到达贡拉待的地方——里加。那三个月正是湿腻腻、雾濛濛的夏天，犹太商人推销货物的营营声不绝于耳，他们是从纽约赶来煞价购买俄国移民们的首饰的。那三个月，军纪还很森严，参谋部闲话不少，军事行动断断续续、到处乌烟瘴气，而且焦虑不安的感觉简直象牙疼病似地隐隐约约地阵阵袭来。第十个星期之初，我终于又见到了贡拉，他面孔苍白，喜气洋洋，就象拉辛在一出悲剧中一开始所描写的奥莱斯特一样。他匀称的身材套着一件制服，这可能是以他姨母那最后几粒钻石中的一粒为代价买来的；嘴唇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使他的样子老象是心不在焉地咬着几枝紫罗兰。他保持了孩童的天真无邪、少女的温柔以及梦游症患者的糊涂胆大，小时候他就凭这股蛮劲骑过公牛以及驾船行驶于汹涌波涛之中。他晚上的时间都用来治些带有里尔克^①味道的歪诗。我一眼就看出我不在的那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活不正常，而且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我必须承认我也是那样：远离贡拉，我的日子过得就象旅行生活似的不安定。他身上的一切都引起我的一种绝对信

^①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

任，除他以外我再没这样信任过别人。他的外形和内心总是宁静的，因为他的单纯坦率使得他无忧无虑，由此他的身心随便忙于什么事也总有最高的效率。这是位理想的战友，正如以前他是个理想的童年伴侣一样。友谊首先意味着可靠，这是它区别于爱情的地方，它还意味着对对方的尊重和绝对信任。贡拉分毫不差地以同样敬重与信任的态度对待我，这一点他已用他的死向我证实了。要是没有战争和革命，贡拉的多才多艺会使他比我吃得开，他的诗会名噪一时，他的俊美亦然，巴黎那些保护艺术的仕女们会对他备加颂扬，他也可能在柏林涉足艺术界。当时的波罗的海地区兵荒马乱，时时都有飞来横祸，而我之所以置身于其中全是为了他，而他呆在那儿也只是为了我。他告诉我克拉托维塞曾被红军短期占领过，奇怪的是却没有遭到损害，这可能是由于小个子犹太人葛里戈利·娄在那儿的缘故，以前这人是里加一月书店的职员，老是讨好索菲，怂恿她看他的书，现在却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尉了。之后，克拉托维塞又被我军夺回，并始终处于战区，随时随地会遭到机枪的袭击和进攻，在最近一次警报中，妇女们都躲进了地下室，索尼娅——这样称呼索菲真俗气——曾异想天开地拼命要出去溜她的狗。

我们的部队驻在克拉托维塞就如同红军驻在那里一样叫我不放心，而且这肯定会耗尽贡拉家的最后一点财物。我了解内战中腐化堕落的军队的底蕴，这些别有用心的坏蛋们在一些还剩有诱人美酒和姑娘们的地方，明目张胆地为自己造了几个冬季宿营地，那儿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可就是这些“保护人”把那地方给毁了。对这些我倒不操什么心，我操心的是克拉托维塞。于是我向上级提出我懂得地形学，克拉

托维塞当地有资源可以利用云云，经过长时间的迟疑不决之后，他们总算看懂了这个浅显的道理。这样靠了一些人的帮助和另一些人的筹划，我如愿以偿地得到这么一个差使——去克拉托维塞所在地的东南分区改组志愿军纵队。这本是个可怜巴巴的任务，而贡拉和我更是可怜。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赶到了克拉托维塞，浑身上下浸透了泥浆，当时我们已是面目全非，弄得那儿的狗对我们狂吠不已：大概是为了显示我那地形学方面的学问，我们俩曾在离红军哨所只有两步远的沼泽地里一直踩着泥浆走到天亮。我们军队的那些弟兄们从饭桌边立起身来——那时他们还在吃饭——慷慨大方地给我们披上两件便袍，这两件衣服是贡拉从前在那最好的年头里穿的，我们发现上面多了几个脏斑和香烟烧出的窟窿。因为过于激动，普拉斯珂薇姨母那抽搐的毛病更厉害了，她脸上的怪象真能使一整支敌军乱了套呢。至于索菲，她已不象少年时期那样虚肿，她很美，短发的发式与她很配称，脸上表情阴郁，嘴角边有一缕酸楚的皱纹。她不再看书了，但晚间总是怒气冲冲地拨弄客厅里的火，还象个易卜生^①笔下厌世的女主人公那样长吁短叹。

我太性急了，还是先仔细描写到家的那会儿为好：米舍尔打开了门，他穿着军裤，上面胡乱套了件仆役号衣，手上高举着一盏马房里用的提灯站在前厅里，因为前厅里的枝形大吊灯不亮了。白色大理石的四壁始终是那付冰冷砭骨的样子，让人想起爱斯基摩式的住所，其中路易十五时代的壁饰是直接 在冰雪上雕刻出来的。贡拉回到这个大体完整的家中

^①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

时他脸上那种温情脉脉和痛惜不已的表情，我怎么忘得掉呢？正扶梯的穿衣镜上方那颗中了一弹而变得不规则了的星形装饰、门把手上的指印、这每个小小的毁损对他都是一种凌辱。两个女人几乎是在二楼的一间小客厅里闭门幽居。贡拉清脆的嗓音使她俩决心硬着头皮走到房门口来瞧个究竟。我看见楼梯顶上伸出一个乱蓬蓬的金发脑袋，索菲沿着扶手一下子滑了下来，脚后紧跟着尖叫的狗。她扑上去搂着哥哥的脖子，然后跳着、笑着拥抱我。

“是你啊？是你们呀？”

“到。”贡拉说道，“哦，不，是特雷比宗德^①王子到！”

他抱着他妹妹在前厅跳了一圈华尔兹舞，又立刻放开她，张开双臂跑到另一个伙伴面前去了。索菲站定在我面前，脸红得象是一场舞会刚刚结束：

“埃里克！你变得多厉害啊！”

“是吗？”我说，“面一目一全一非。”

“那倒不是。”她摇着头说。

“为浪子哥哥干杯！”小个子的弗朗兹·冯·阿朗站在饭厅门口叫着，手里拿着一杯酒追赶起索菲来，“索菲，只要你吃一滴，

“你想捉弄我吗？”姑娘带着讥诮的神情说道，然后突然从这位青年军官伸着的手臂下钻了过去，消失在通向厨房的半掩着的玻璃门后，同时大声说道：

“我去叫人给你们拿吃的来！”

^① 特雷比宗德是中世纪希腊帝国的国名。

这当儿，普拉丝珂薇姨母在二楼凭栏而立，轻轻地擦她那泪眼婆娑的脸，感谢所有东方正教派的神应验了她为我们做的那些祷告，嘴里叽叽咕咕的象只老病鸽。她的房间里透出一股死气沉沉的腊味，摆满了被腊烛熏黑了的神像。其中一座相当古老，银子做的眼皮里早先嵌着两粒祖母绿，在布尔什维克短期占领期间，一个士兵弄走了宝石，现在普拉兹珂薇姨母就在这瞎眼的庇护人面前祈祷。过了一会，米舍尔从地下室端了盆熏鱼上来。贡拉大声唤她妹妹，可没有回音，弗朗兹·冯·阿朗耸耸肩膀对我们说，她肯定整晚也不会再露面了。于是我们就自管自吃晚饭了。

第二天，我在她哥哥屋里又见到她，但每次她都设法悄悄地溜开，象只小野猫那样灵活。可是在我们刚到家时，她在一阵兴奋之中曾扎扎实实地吻过我，我当时不无惆怅地想到我这是第一次得到姑娘的吻，并惋惜我父亲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妹妹，我当然尽可能把索菲当妹妹看。战争期间，克拉托维塞的生活照常，使唤人员减缩到只剩下一个老女佣和园丁米舍尔，家里还夹有几个从克隆斯达逃出来的俄国军官，他们就象来参加一场冗长乏味的狩猎的客人那样碍事。有那么两三次，我们被远处的枪声惊醒，为了消磨那漫漫长夜，三个人再加上一个虚设的死人便打起桥牌来，对这假定的死人，我们总是用我们新近阵亡的士兵中的一个名字称呼他。这时，索菲的积郁会间或冰消瓦解，但她那惴惴不安、心慌意乱的风度却始终改不了，就象有的地方在春回大地时仍保持着冬天的严寒。一盏小灯正对着她，使她苍白的脸和手有了一点儿光彩。索菲正好和我同年（这一点早就该让我想到要提防点儿），虽然她身材丰满，我却老觉着她看上

去象是少年时期受过什么摧残似的。显然仅仅两年战争不可能把这张脸上的每根线条都变得如此执拗和悲恸，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正值穿着白礼服参加舞会的年龄，她却必须经历挨枪弹的危险，必须忍受听人说起强奸和酷刑事件时的那种恐怖，常常处于饥饿状态，无休无止地忧心如焚。她楚楚可怜地睁大了眼睛，努力适应那些与少女幻想大相径庭的场面。但是，如果我没搞错的话，索菲并不是个软心肠的人，她只是心地十分宽厚罢了，人们往往混淆这两种近似的毛病。我总感到对她说来发生了比国家和世界动乱更为根本性的事情，我渐渐明白了她曾一连几个月与那些酗酒而暴戾的男人们住在一起而不断担惊受怕。有几个混帐东西早两年很可能成为她的华尔兹舞伴，如今却很快教她懂得那喁喁情话下所隐藏的真相；夜晚，姑娘的房门被敲了多少次，多少手臂曾勒紧她的腰，而她得用力挣脱，还要当心不致弄坏那已磨损了的旧裙子，还有那柔嫩的胸脯……总之我面前是一个遭到淫念摧残的小姑娘。那些寻花问柳的色鬼们对女人是见一个爱一个，我与他们截然不同，我认定索尼娅绝望是有道理的。有一天早上，米舍尔在花园里拔土豆苗，我终于从他口里知道了那众所周知的秘密。我的伙伴们出于礼貌，对此始终守口如瓶不让贡拉知悉：索菲被一个受了伤疏散到后方来的立陶宛中士强奸了，那个男人当时是喝醉了。他第二天便来到客厅，跪在三十来个人面前哭着请求宽恕。这一幕对索菲来说比前晚那可怕的一刻钟还要令人恶心。一连几个星期，这小姑娘沉浸在对这件暴行的回忆和对可能怀孕的恐惧之中。后来不管我与索菲有多亲密，我从来没有勇气提起这件不幸的事，在我们之间这是一个到了嘴边却千方百计老是

迴避的话题。

但是真怪，这段事倒使我更接近她了。以前的索菲是白璧无瑕，就是说受到很好眷护的，她本来恐怕只会使我隐约感到厌烦和局促不安，正象在柏林时见到妈妈那些朋友的女儿时的那种感觉。可是索菲被玷污后，她的生活经历就变得与我相仿了，因为她那段中士的插曲说来奇怪，竟让我想起在布鲁塞尔一家妓院中我唯一的那段下流往事。后来，由于糟糕的爱情分了她的心，她倒好象完全忘了这次不幸遭遇，我却反倒不停地想着这件事。我在这一点上陷得如此之深，这大概是我能用于解释我后来之所以给她造成痛苦的唯一理由。我和她哥哥回到克拉托维塞后，渐渐使她恢复了 she 一度失去的女主人身分，在这以前她在自己家里只不过是吓呆了的囚徒。现在她同意主持一日三餐并显出一副令人爱怜的老三老四的样子。军官们吻她的手，在短短的一瞬间，她的眼睛又射出了坦率的光芒，这是一个高尚的灵魂在发光，随后，这双能表达一切的眼睛又变得窘迫慌乱了。我只有一次看见她的眼睛闪耀着令人赞叹的清澈透亮的光彩，当时的情景此刻还历历在目。

为什么女人们恰恰都是爱上那些命中注定不属于她们的男人，从而落得不是自己改了性情，就是切齿痛恨那些男人呢？我回忆到克拉托维塞的第二天，看见索菲满面通红，几次突然溜开，还有那种与她的襟怀坦白那么不相符的斜睨的目光，我以为这是一位天真少女看见陌生人时十分自然的一种手足无措的表现，后来我知道了她的不幸遭遇，就比较合乎情理地认为这是一种惭愧得无地自容的表现，因为她见着她哥哥时也是这样。这种理解一度是正确的，但我满足于这种